



夏中漢

珍貴的心

夏中漢

珍貴的心

朱學範題



责任编辑 龙国义
封面设计 孙晓云

珍 贵 的 心

夏中汉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四川省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3.625印张 62千字 5插页

1987年6月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150

书号10115·721 定价0.80元

夏中漢雜文選

珍貴的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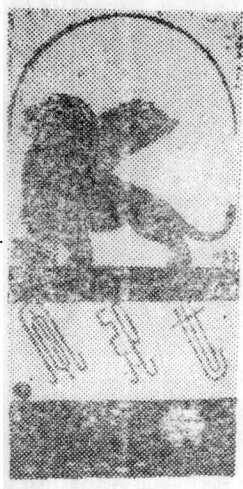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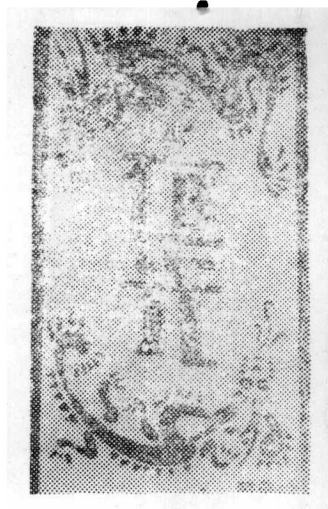
朱學範題



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朱學範的題字



作者近影



作者在1938年5月为上海文汇报《世纪风》所作“吼狮图”及同年8月为上海《大美晚报》“夜光”所作“怒龙图”



作者与夫人陶艾因女士在龙门石窟
留影



S. 2



S. 9

作者与邮票设计专家孙传哲先生合作设计的
“伟大的祖国”邮票



抗战初期的上海（代前言）

陶菊隐

一、中日全面战争开始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侵略者向北平附近芦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，当地守军被迫起而应战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“七·七事变”，即“芦沟桥事变”。八月十三日，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，进犯吴淞、江湾等地。日军进攻上海，严重影响西方帝国主义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四大家族的利益。因此，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严切督促下，国民政府不得不派兵应战。至此，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了。

二、发生战事后一瞬间的快速镜头

“八一三”以前，上海的畸形繁荣正在逐步褪

色，人口不断下降，社会购买力日益萎缩。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内，在马路旁的电杆子上，空屋出售或出租的告白日见其多，许多大房东用减租、让租或将房屋修饰一新等条件吸引新房客，但是过问者仍旧寥寥无几。市场方面，不少大商店登载“大拍卖”、“大放盘”的巨幅广告，宣称“不顾血本，推销存货”；南京路、福州路一带中小型商店甚至经常雇用音乐队吹吹打打，有的叫两个店员站在柜台外长凳上大声叫嚷作滑稽对口，吹嘘价廉物美，以招徕顾客。但是买货的人远比看热闹的人少。其他服务性行业包括旅馆、酒楼、舞场、出租汽车等，也都门庭冷落，大非昔日可比。

但是，“八一三”的炮声一响，迅速改变了上海经济萧条的趋势。当闸北战火掀起之时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立即宣布“中立”。国民党市政府当天由江湾新市区迁回枫林桥旧址办公。住居在闸北、虹口等处的外侨和中国殷实之家，就象滚滚浪花一样涌进到苏州河南岸来。沪宁、沪杭两铁路沿线的大地主、大豪绅也都纷纷集中到这个“中立”之区来。因此，尽管租界外炮火亘天，杀人盈野，租界人口却在直线上升，所有空屋很快就被填满了，优待新房客的种种条件也都被取消了，代之而起的是租屋的顶费和过户费。

同一时期，闸北、真如、浏河一带的农民、手工业者在炮火中无法安居，也都扶老携幼转移到租界来。仅“八一三”一天，就有难民六万多人涌入

租界。在这些人中有的用板车或老虎车，有的肩挑背负，把一些能够带走的东西都带到租界来。租界当局对于无家可归的难民，本拟拒之门外，曾将租界边沿几扇大铁门紧紧关闭，但因人多势大，租界当局无法阻挡，只得将租界内若干学校、庙宇和公共场所腾出来，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。他们一面号召各界人士捐助寒衣粮食，一面把山东、苏北、浙江等地的近地难民分批遣送回籍。但是，随着战区的继续扩大，各地难民源源而来，租界当局无法全部收容，于是来得较晚的难民，只得在弄堂口或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。这一情况，租界当局又认为有碍市容，曾经加以驱逐，因此除南京路、霞飞路等几条主要马路绝对不许停留外，其他各处也只得眼开眼闭，暂时不去管它了。这些劳动人民，对于日本侵略者横蛮无理地蹂躏他们的家乡，破坏他们的生产，无不切齿痛恨，对于西方殖民者的歧视和压迫，也都愤恨异常。他们在风餐露宿之中挣扎了一个时期，不久便纷纷选择租界偏僻地区搭棚而居，以个体劳动或摊贩为生，这就是“八一三”以后上海棚户和摊贩大量发展的由来。

在上海一个多月的战争中，敌机在近郊各处疯狂投下燃烧弹，闸北一带化为火海，留在当地未走的人们，也不得不冒着炮火进入租界。因此，到九月中旬，租界人口迅速增加到三百万左右，租界外却成了十室十空的无人区。

战争刚开始时，两租界宣布戒严，大部分商店

停止营业，公共车辆全部停驶。从租界高处可以望见战区内腾起的闪闪火光，隆隆的炮声昼夜不停。租界铁门和各国驻军在租界边沿布置的沙包、鹿砦、铁刺网等障碍物，有时封闭，有时开放，搞得租界内也人心惶惶。但是，这种战时气氛不久又都消逝了：由于人口迅速集中，特别是上海附近地区的地主富室纷纷避难前来，租界的畸形繁荣又告复活，旅馆、电影院经常客满，茶楼酒肆川流不息地吐纳着衣冠楚楚的人群，各种商店也无不生意兴隆。这些外地来的阔老，是租界殖民者所欢迎的，因为他们对租界繁荣带来了好处。

由于上述情况，上海租界内外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：苏州河一水之隔，一边是炮声震天，一边是笙歌达旦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，透过幽暗的夜空，与闸北的火光联成一片，映红了半边天。但是，如果把租界内形容为完美无缺的“天堂”，那是幼稚可笑的，它也是“天堂”，与地狱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另一鲜明的对比。……至于人吃人的社会制度，这里就不多谈了。

以上情况，不过是上海发生战争后一瞬间的快速镜头。总的说来，租界人口的迅速集中，是由于不少人认为这个嵌在中国领土上的“国中之国”，在中日战争中成了一个“中立国”，安全不成问题。但是，租界是否如一般人所想的安全，这个问题，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有了明确的答案。

三、抗日救亡团体的不同倾向

“八一三”战事发生后，上海租界出现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和救济性的临时组织。这些团体的背景：有的是左翼革命派组织起来的；有的由爱国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主持；有的以民族资产阶级或外交界人士为核心。在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，也有由国民党人士与左翼人士联合组织的。

这些团体虽然同以抗日救亡为号召，可是由于背景的不同，所走的路线也不同，在内政问题上：左翼革命派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，坚决主张开放一切民众运动，实行言论自由，释放全国政治犯，结束一党训政，成立一个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；以国民党CC系为核心的团体，则提出所谓“一个政府，一个领袖”的反动口号，反对发动民众，反对开放政权。这些人及其追随者们，以民间姿态组织团体或者加入某些进步团体，其目的在于侦察社会动态，分化左翼阵营。在外交问题上：左翼革命派主张争取一切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们的帮助，反对牺牲中国以绥靖日本的国际阴谋；国民党人则寄希望于西方三大国，特别希望英美两国出面来调解中日战争。在军事问题上：左翼主张坚持抗战，反对中途妥协，主张全民抗战。这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方针又是背道而驰的。此外，一般知识分子组织的

团体，无论在内政问题、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上，都缺乏鲜明的旗帜和坚定的立场。他们主张开放政权，反对个人独裁，这是与左翼革命派一致的，但对号称“民主”的某些西方国家抱有幻想，特别希望将在比京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联合会议上，能够作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，压迫日本政府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战争，这一点又与国民党人共鸣。

“八一三”战事发生后，上海妇女界的救亡活动也很活跃，她们举办过书画展览会、义卖作品，用以慰劳前方将士。还举办过妇女捐献首饰以及其他募捐，义卖活动，分别作为慰劳将士和救济难民之用。妇女活动也和其他团体一样，由于成员们的阶级成分不同，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和倾向。

除团体活动而外，上海市民自发性的抗日斗争和爱国活动，也在广泛开展。从战事发生的一天起，上海各报的销路突然大增，每次发行号外，立刻抢购一空，这是上海市民关心军国大事的热情表现。当时市井流传，有的说日本间谍化装为中国难民，混进租界来侦察中国方面的各种情报；有的说日本浪人指使汉奸在近郊河塘放毒，勾结奸商运粮接济敌军或将日货改装国货出售牟利等等，因此捉汉奸、检查日货和搜捕奸匪的事件层出不穷。上海各界人士发起“一元救国捐运动”，劳动人民热烈响应，纷纷将血汗收入送请银行或报馆代收，大多不肯留名而去。这些行动，充分表达了中国劳动人民对于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四、日伪·流氓·汉奸·特务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，日本侵略者找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汉奸苏锡文，在浦东成立了“上海大道市政府”。这个政府不挂青白旗或五色旗，挂的是一面绘有太极图的杏黄旗。它成立后的第一号布告是公开征收鸦片烟税，凡烟民必须领取执照，执照分为三等：甲等纳税五元、乙等三元、丙等六角。对于这样一个妖里妖气的政府，中外人士无不嗤之以鼻。

“大道政府”不能在上海租界内大行其道，于是日本侵略者又于是年十二月下旬物色一批“绅商闻人”，打着“救济难民，恢复生产”的幌子，成立了“上海市民协会”。这是他们准备在租界内成立伪政权的一个步骤。十二月三十日，参加市民协会的天主教徒，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，由吕班路寓所外出，刚上汽车就被一个伪装水果小贩的人开枪打死。这是汉奸在租界上被狙击的第一人。参加市民协会的米大王顾馨一，有人在他的亚尔培路住宅天井里投了一颗手榴弹。经此两次风波，“市民协会”便有风流云散之势。

国民党军西撤后，国民党军统在租界内留下了潜伏组，用暗杀、绑架和匿名信等手段对付汉奸、奸商和妥协分子，造成了不少血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日本侵略者采取了“以牙还牙”的手段，也在

虹口区组织了流氓特务组织“黄道会”，来同军统唱对台戏。

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，法租界薛华立路巡捕房对面电杆上悬挂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，附有“除奸状”白布一方，上写“抗日分子结果”六字。被害人为《社会日报》负责人蔡钧徒。其实，《社会日报》是一种销路不广的小报，蔡非报界知名之士，也不是真正的抗日分子。……当时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法租界接连发生四颗人头和三个断指的怪案，加上挂洋旗的《文汇报》和《华美晚报》，均有歹徒前往投弹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不久，法捕房捕获嫌疑犯杨家驹、许德林等多人，解往特区法院讯办，此案很快就水落石出了。

原来，自国民党军西撤后，日本侵略者在虹口新亚酒店内设有“兴亚会”，收罗流氓帮会，破坏租界秩序。他们找到了绰号叫“江北杜月笙”的流氓常玉清，叫他在新亚酒店内成立“安清总会”，受兴亚会的指导，并在总会下成立一个流氓特务组织，名叫“黄道会”，派日本浪人小村为顾问，其目的在于制造恐怖气氛，镇压抗日活动。常是个老牌汉奸，一九三二年“一·二八”之役，曾伙同一批汉奸组织“闸北地方维持会”，战后逃往大连。此番卷土重来，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成立黄道会，招了一批流氓光棍，向日方领得凶器，就在成立后三天之内行动起来。据杨家驹供称，他们都是黄道会会员，所有在法租界内发生的人头、人指案，都是奉日人